

FUDAN JOURNAL

# 复旦学报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ISSN 0257-0289

1935年创刊

2013  
双月刊  
社会科学版

5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第55卷 (总第268期)



## 目 录

### 跨越空间的文化

- 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 周振鹤 001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随槎录》的史料价值 王鑫磊 019  
——兼谈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

### 近代史研究

- 近代外交的“通信变革” 马建标 林 曦 030  
——清末民初国际宣传政策形成之考察

### 域外新刊 特约栏目主持人 陈引驰

- 才女之累赘:李清照的重塑与再造 [美]艾朗诺 040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 王国维与胡适:回归古典与文学革命 彭玉平 047

###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在赞赏的背后 陈学明 金瑶梅 055  
——评福山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实质与用意  
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 关春玲 064

##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随槎录》的史料价值 ——兼谈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

王鑫磊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1780年朝鲜燕行使团成员卢以渐所撰《随槎录》,与著名的《热河日记》产生于同一使行活动,而其受关注程度却远不及后者。该文献为我们留下了诸如六世班禅朝觐乾隆事件、卢氏与蒙古族学者博明有关清代学术问题的笔谈等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而其字里行间体现出的“尊明排清”思想,则是明清鼎革以后朝鲜士大夫普遍心态的延续。将其与《热河日记》对比来看,可以讨论朝鲜王朝“尊周思明”和“北学”两种思想的关系。最后,论文指出清季朝鲜的“小中华意识”不应再被理解为是对清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的尊崇和依附,而是转变为其借以形塑自身独立国格的一种思想资源,故亦可视作其民族意识的滥觞。

[关键词] 卢以渐 随槎录 朝鲜王朝 小中华意识

公元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朝鲜正祖四年)农历五月,朝鲜王朝向清朝派遣了一支进贺兼谢恩使团,其主要目的是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岁寿辰。该使团正使为朴明源,副使为郑元始,书状官为赵鼎镇。这次活动的基本情况,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扼要记载,<sup>①</sup>在《同文汇考》中收录官方往来文书中可窥一斑,<sup>②</sup>虽然使团三使(即正使、副使和书状官)似乎没有单独的燕行录传世,<sup>③</sup>但要了解这次使行活动的细节却并不缺乏材料,在使团的随行人员中,有两人留下了详细的使行记录,即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以及卢以渐的《随槎录》。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可以说是燕行文献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在当下韩国历史学界,谈到燕行文献仍然言必称《热河日记》,同时它也是较早被系统介绍到中国大陆学界并出版了点校本的燕行文献之一。<sup>④</sup>可以说,不管是在韩国还是中国,《热河日记》无疑都是研究者关注时间最早、利用频

[收稿日期] 2012-06-29

[作者简介] 王鑫磊,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本文为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项目“从周边看中国”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1RWXKZD024)。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者交流”项目的韩国访学资助,同时得到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的资料文献帮助,在此深表感谢。本文初稿曾在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2年年会上宣读,得到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等学者的宝贵意见,同样表示感谢。

- ① 关于这次使行活动,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两条相关记载。一是正祖四年三月二十日条:“朴明源为进贺兼谢恩正使,郑元始为副使,韩光近为书状官,寻病递,以赵鼎镇代之”,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45册,探求堂,1963年,第159页。二是正祖四年九月十七日条:“进贺兼谢恩正使朴明源、副使郑元始状启言:臣等一行,八月初一日,到北京,诣礼部呈表、咨文……(略)”该条照录了正副使递交的状启,详细汇报了使团完成任务的情况,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45册,第183页。
- ② 有关1780年朝鲜进贺使行的官方往来文书,收录在《同文汇考》第一册,进贺九,“乙亥(正祖三年)贺皇上七旬表及方物付进年贡使咨”,见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翰近印刷公社,1978年,第284—289页。
- ③ 关于这一点,笔者翻阅了目前出版的各种燕行文献资料,并在韩国各主要图书收藏机构网站进行检索,均未有发现,此处暂且存疑,欢迎知情者提供线索。
- ④ 另外一种较早被介绍到中国大陆的燕行文献是由葛振家教授点注出版的崔溥的《漂海录》。这两种文献之外,目前尚无其他燕行文献在大陆被点校出版的个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正致力于燕行文献导读类著述的撰写,其实也是一种文献点校的工作。近年所见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顺利教授所著《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往来日记导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朝鲜文人李海应〈蕝山纪程〉细读》(学苑出版社,2010年)即为此类作品。

率最高、研究成果最丰的一部燕行文献。然而,比之《热河日记》的知名度,产生于同一次使行活动的《随槎录》,就显得不那么受重视,原因可能有两种:其一是内容的问题,《热河日记》的广受关注,是由于其中留下大量有关中国情况细致入微的记载以及其后来被追奉为朝鲜时代“北学”思想圭臬两方面的原因,《随槎录》在内容和价值上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其二是技术上的原因,该文献在林基中教授整理出版的《燕行录全集》第41册中收录,但因为目录编排上的错误,使得它与《热河日记》产生于同一次使行活动的这一联系被意外掩盖,<sup>①</sup>或也是导致其没引起太多研究者关注的原因之一。目前所见,韩国学界仅有个别几篇从文本内容和文学价值角度分析《随槎录》的文章,<sup>②</sup>而中国学者相关研究几乎未见。

我在参与一项燕行文献的出版项目时接触到这一文献,<sup>③</sup>发现了它与《热河日记》的关联,而在通读该文献之后,一方面发现它和其他燕行文献一样为我们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到,如将其和《热河日记》放在一起考察,还可以延伸出去探讨一些深层次的话题,比如朝鲜时代的“尊周思明”思想、“北学”思想和“小中华意识”等。

## 一、卢以渐及其《随槎录》简介

### (一) 卢以渐其人

卢以渐(1720—1788),字士鸿,号楸山,本贯万顷。<sup>④</sup>万顷卢氏一族历史上,曾出现卢应院、卢应暉、卢应皓三兄弟于“壬辰倭乱”(即1594年丰臣秀吉派兵侵入朝鲜的事件,日本称为“文禄之役”)中组织义兵追随之名将赵宪英勇抗倭,并最终和赵宪在金山之役中共同赴义的事迹,时称“三义士”。<sup>⑤</sup>但其家族辉煌史也仅此而已,整个朝鲜时代,万顷卢氏一族中科举及第者仅有七人,怎么看也算不上是两班望族。卢以渐的父亲卢彦骏是以武科出身仕官,所以他并没有深厚的家学基底,学习道路走得也比较艰难,直到37岁才通过司马试取得进士身份,<sup>⑥</sup>这在当时朝鲜来说绝对算是“高龄”进士。在仕途上,卢以渐也没有太大的成就,仅担任过长陵参奉和汉城府西部奉事等比较低微的官职。然而,家族史上的“三义士”事迹,对其思想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在“壬辰倭乱”

① 林基中先生所编《燕行录全集》的总目录中有“燕行年代顺目录”,而这两部文献并没有被放在同一年代目录下。其中1780年下有《随槎录》,但无《热河日记》,《热河日记》竟被放在1751年下,不仅如此,目录的错误还在于把《随槎录》燕行年代干支纪年标注为“肃宗四六 康熙五九 庚子”,整整提前了六十年。参见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0卷,总目录,“燕行年代顺目录”,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第271—272页。

② 韩国学者相关的研究有:南权锡:《关于新发现之卢以渐〈随槎录〉书志的研究》,[韩]《图书馆学论集》第23辑,1995年,第405—407页;权延雄:《卢以渐的〈随槎录〉:解題和原文标点》,[韩]《庆北史学》第22辑,1999年,第141—239页;金东锡:《有关卢以渐〈随槎录〉的研究——与〈热河日记〉比较的角度》,[韩]《韩国汉文学研究》第27辑,2001年,第259—302页;金东锡:《朝鲜后期燕行录的美学特质:〈随槎录〉与〈热河日记〉的内容比较》,[韩]《东方汉文学》第49辑,2011年,第191—221页。

③ 2009—2011年,我参与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编撰出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项目,其间接触到这一文献。这部丛书于2011年7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随槎录》收在该丛书第21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部丛书出版时已经注意到《随槎录》与《热河日记》在时间上的关联性,将两者相邻编排收录,在文献解題中特别指出这一点,并提示了两者进行比较阅读的可能性。参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④ 今韩国全罗北道金堤市万顷邑一带。

⑤ 今韩国忠清北道报恩郡水汗面有纪念赵宪的后栗祠,祠中有一碑文提及卢氏三义士事迹:“万顷卢氏,以高丽平章事万顷君克清为鼻祖,入我朝,讳革,文科牧使。生讳自羽,生讳竹鸣,俱参奉。生讳一全,生讳世得,俱奉事,赠参议、参判。参判公娶咸安赵氏泽之女,生三男,长曰应院、次曰应暉、季曰应皓,世所称三义士者也。长公字明远,号守庵,自幼颖悟,长而重,以孝友文学世其家,师事重峰赵文烈先生。当壬辰倭乱,与二弟倡率义旅从先生矢死讨贼,享怀仁后栗祠。”又,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牛城面贵山里有万顷卢氏三义士生家址(出生地故居),内设三义祠,并立有三义士殉义碑。

⑥ 朝鲜时代科举分小科与大科,小科考试又称司马试(朝鲜根据《礼记·王制》将生员进士称为司马),是生员取得进士身份的考试,只有通过小科考试,才有资格参加大科考试。大科分为分文科、武科、杂科,通过初试、复试后就算合格,最后参加殿试,然后可以被授予官职。也就是说,司马试是大科的资格考试,而大科考试才是决定能否入仕为官的考试。

中给予朝鲜援手的明朝被清朝取代后,其因追崇先祖而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尊明排清”的思想,这一点在《随槎录》中多有体现。而根据《万顷卢氏世谱》记载,卢以渐有遗稿二十一卷,算是不少。另据记载,他与当时以诗文闻名的申光河(1729—1793)素有往来,由此推测他在文章、诗文方面当有一定造诣,而这一点从《随槎录》中留存的诗文材料也可得到印证。1780年,卢以渐已经61岁,如此高龄尚被指派前往中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可以在使行途中起到类似顾问的作用,这一点从《随槎录》中他对一些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考据性文字中亦可见一斑。<sup>①</sup>

## (二)《随槎录》文献概述

首先,关于文献的版本,目前已出版的《随槎录》有两种。其一是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第41册收录,其二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1册收录。而其原本藏在韩国庆北大学中央图书馆,为笔写本,不分卷,一册,总共有169页,图书编号为:古811.5ㄴ69入。<sup>②</sup>

其次,关于文献的内容。卢以渐的《随槎录》是将该次使行前后约五个月的出使过程按照时间顺序,以日记形式加以记载,这也是最常见的燕行文献记录形式。从中我们看到,使团的行程大致是:五月二十五日从汉城(今首尔)出发,八月初一抵达北京,因乾隆在热河的行宫“避暑山庄”接见宴请各国使节,使团部分人员于八月初五日前往热河(卢以渐未随行),又于八月二十日返抵北京,九月十七日离京返回,十月二十七日返抵汉城。具体来看,该文献前三分之一记载的是从汉城出发到北京城的路途经历,其中包含对路线里程、沿途山川风貌、名胜古迹、风俗民情等的记载。之后便是抵达北京之后的记录,最后是返程记录。因为这次使行的一个特殊任务是进贺乾隆七十寿辰,所以该文献中也就有了一些以往燕行文献中不多见的內容,如有关使团的热河经历和乾隆庆寿场面的转述。以上内容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当都有一定研究价值,后文将选取几条材料举例说明。

## (三)《随槎录》与《热河日记》之比较

总的来说,这两部文献可以从体例和内容两个层面加以比较。从体例上看,《随槎录》采用燕行文献最常见的日记体,而众所周知《热河日记》的体例在燕行文献中是属于比较另类的,它并非严格按日记事,而是采用一种主题式的记载,仅在部分主题下以日记事。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热河日记》曾一度因为所谓的“文体不纯正”而受到过指责,不过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文献内容而不是体例,所以以文献所包含的信息量和资料价值来说,无疑《热河日记》更胜一筹。

从具体内容上看,《随槎录》虽然篇幅有限,但还是有其特定的史料价值,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随槎录》的记载可以和《热河日记》形成一种史料互补。《随槎录》按日期记录了出使的全部过程,即从五月二十五日出发到十月二十七日返抵,而《热河日记》的记载中并没有一头一尾即从汉城到义州、从北京回汉城的行程记录,从这一点上说,《随槎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勾勒这次使行的全貌。其二,通过对比两种文献所体现的作者的不同观念,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随槎录》处处充斥着卢以渐“尊明排清”的思想,或者说“尊周思明”思想。<sup>③</sup>而朴趾源《热河日记》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对新事物的兴趣和对新知识的渴求,代表了他所抱持的向清朝

① 关于卢以渐其人情况,参见前引《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中《随槎录》解题,见该书第21册,第167页;权延雄:《卢以渐的〈随槎录〉:解题和原文标点》,第142—143页;金东锡:《有关卢以渐〈随槎录〉的研究》,262—264页;韩国系谱研究院编:《韩国人族谱》,日新阁,1977年,第363—364页,“万顷卢氏”条。

② 原本所藏处信息,在《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中提到,而《燕行录全集》未提及。但后者收录的《随槎录》版本,从字迹、版面布局以及纸张底纹细节等方面看,基本上可以断定也是庆北大学中央图书馆的藏本,但是《全集》收录的这个版本,页数却只有165页,较之《选编》少了4页。经查系《全集》本存在缺页问题,所缺为原本第39、124、156、157页,也即《选编》本的第211、296、328、329页。鉴于此,本文的引注,都以《选编》本为准。

③ 关于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问题,可参考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学习先进文化的态度,也即所谓的“北学”思想。“尊周思明”和“北学”,看起来是互不相容的两种思想,而它们又恰恰在18世纪末参与同一次使行活动的两个人留下的两部文献中同时展现出来,这到底有着怎样的意味?

## 二、《随槎录》所见史料举要

### (一) 永远恭顺,自然获福:有关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的记载

朝鲜使臣一行到热河进贺期间,在乾隆的授命和清朝礼部的安排下,进见了当时正在热河朝觐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从卢以渐和朴趾源的记载看,朴趾源应该是直接参与了这次进见,而卢以渐是根据同伴的转述进行记录。六世班禅的这一次朝觐活动被视作清代历史上民族宗教事务的重大事件,相关研究很多,并且已经有学者关注到并利用《热河日记》的材料展开讨论。<sup>①</sup>《热河日记》中提到班禅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黄教问答”、“班禅始末”、“扎什伦布”、“行在杂录”等篇章。《随槎录》中对班禅一事的记载篇幅不长,所记内容比之《热河日记》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尤以不同处所传递出的信息值得注意。

比如,卢以渐的记载中说乾隆皇帝对班禅礼遇有加:“乾隆送皇子第几王及大臣永贵迎来自今七月,待以师父,载之以黄屋车,处之于别宫,皇子诸王皆叩谢于床下。乾隆与德尼并席而坐,礼貌甚挚”,又如指出乾隆厚遇班禅的目的是“要藉其灵以镇蒙古人”,<sup>②</sup>以及记述由传言得知的班禅神迹:“闻班禅自蕃来时,有大江当前,班禅舍舟而马渡,水决而利涉。尝与乾隆对坐饮茶,忽掷茶器于地,乾隆恠而问之,答曰某州某里方有火灾,绵延数千家,故以此救之,其后果自某州报云,某日某时某里失火,忽有骤雨注而灭之,乾隆以此益敬信云”<sup>③</sup>等等此类内容,大体在《热河日记》中都有体现。

此外,对于班禅的形象,两人都有记述。卢以渐的记载是:“班禅面貌甚大,眼睛不明,见甚阴沉,着黄僧巾样鲁笠帽子而极高,衣黄僧衣而状似长裳,袒一臂而踞坐于榻上,如真佛样。”<sup>④</sup>朴趾源的记载是:“班禅跏趺南向坐,冠黄色毳毳,有鬣,状似靴,高二尺余,披织金禅衣,无袖,祛挂左肩,围裹全躯,衽右腋下露垂右臂,长大如腿股而金色,面色深黄,圆几六七围,无髭须痕,悬胆鼻,眼眉数寸,睛白,瞳子重晕,阴沉昏冥。”<sup>⑤</sup>显然,两种记载具有一致性,而以朴趾源记录班禅形象更加细致,但卢以渐的记录,无疑也起到了一种印证作用,让我们对班禅的穿戴服饰,以及脸庞较为圆大、眼睛阴沉等面貌特征得以进一步确认。不仅如此,两人都提到班禅眼睛阴沉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据记载,六世班禅是于该次朝觐期间在北京圆寂的(十一月初一日),据说是因为感染了天花(十月二十七日发现)。<sup>⑥</sup>从感染天花到圆寂,即使是在皇宫御医的照料之下,仅仅只有五天左右的

① 相关研究情况可参见柳森:《国内近三十年来关于六世班禅朝觐研究综述》,《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该综述文章中提到了大量相关的研究专著、论文以及资料汇编。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作者已经指出《热河日记》的记载可以弥补相关史料的缺憾,具有文献比较研究价值。同时还提到两个利用《热河日记》展开研究的个案:廉松心的《〈热河日记〉与清代民族政策研究》(《北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张双志的《18世纪朝鲜学者对清代西藏的观察——读朴趾源〈热河日记〉》(《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

② 参见《随槎录》,收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1册,第266—267页。乾隆对六世班禅的礼遇,是希望借助宗教手段巩固民族统治,这一点当无疑义,而卢以渐同时提到,蒙古当时是乾隆最头疼的问题:“蒙古四十八部最为强大,乾隆畏之,待之甚厚,累与连婚,而患之弥甚。”因而乾隆“闻班禅最为蒙古之仰慕,特为招致,要藉其灵以镇蒙古人”,清代蒙古族普遍信仰黄教,班禅是其宗教信仰领袖,其政治立场对蒙古有直接影响,卢以渐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③ 同上书,第267页。在《热河日记》中同样有关于班禅“撒茶灭火、凌波渡河”的记载,且关于“撒茶灭火”的记述更为详细,卢以渐听到语焉不详的“某州某里”,在朴趾源听到的版本中,明确说是北京正阳门外琉璃厂,参见朴趾原著,朱瑞平点校:《热河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71—172页。

④ 见前引,《随槎录》,第267页。

⑤ 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84页。

⑥ 参见杜江:《六世班禅朝觐乾隆事略》,《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

时间,这可能是因为六世班禅身体健康状况本来就很差,而卢以渐和朴趾源不约而同提到的眼睛阴沉或者说眼睛无神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他身体状况差的一种反映。

关于朝鲜使臣进见六世班禅的情况,在正副使回国后的汇报状启中没有提及,但见于《同文汇考》所收清朝礼部奏闻,<sup>①</sup>而在《热河日记》“扎什伦布”一篇中以及《随槎录》中都有记载。若把这三方面的记载对比来看,颇有意思。在礼部奏闻中,称礼部官员“带领朝鲜使臣”“拜见”班禅,向班禅“行礼”,并称使臣在接受班禅礼物后“当即叩谢”。而在《热河日记》的“行在杂录”中,朴趾源专门摘录了这封奏闻并指出所谓“拜见”、“行礼”和“叩谢”等情节“皆妄也”。<sup>②</sup>据朴趾源记载,朝鲜使节在往见班禅之前,就坚拒礼部提出的向班禅行叩拜礼的要求,称“拜叩之礼,行之天子之庭。今奈何以敬天子之礼,施之番僧乎?”虽然争议没有结果,但据朴趾源说,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向班禅行叩拜礼。<sup>③</sup>再来看卢以渐的记载:

乾隆使我使臣往见班禅,辞不得以而往见之。班禅问何为以入来,使臣对以故。班禅笑而曰:“永远恭顺,自然获福”。以乾隆命赐使臣毡毯藏香毡子等物,又各付铜佛一个,使臣辞而不受,礼部累加恐喝,事将生梗于国,故不得已受之,付诸译官。<sup>④</sup>

卢以渐提到使臣“辞不得已而往见”,这一点可以印证朴趾源所说与礼部争议的情况,他们之所以要“辞”,就是不愿向班禅行叩拜礼。至于接受礼物一节,使臣同样是“辞而不受”,最后在礼部“累加恐喝”下“不得已受之”。可见,卢以渐也没有提到叩拜和叩谢,这和朴趾源是一致的,那么出问题的应该就是清朝礼部的奏闻了。

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情况是,在卢以渐的记录中提到,班禅对朝鲜使臣说了一句“永远恭顺,自然获福”,这和礼部咨文所记一致。但是,在朴趾源的记载里面,却没有这句话。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可是,礼部和卢以渐的记录可相佐证,且卢以渐没有理由会配合清朝礼部来虚构这样的情节,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班禅确实说过这句话。那么,是不是朴趾源的记录出了问题?事实上确实如此。从朴趾源自己记载的一个细节我们能够找到答案:他说在进见班禅的时候,有一位叫赵达东的使节因心中不满而小声咒骂班禅,说他是:“万古凶人也,必无善终理。”<sup>⑤</sup>于是我们联想到,朴趾源当时大概是因为在和其他人窃窃私语,开了小差而没有听到班禅的“教诲”。试想,如果没有卢以渐的记录作为佐证,在班禅是否说过那样一句话的问题上,仅凭清朝礼部和朴趾源的不同记载来看,恐怕又会争议不下。

六世班禅的这句话“永远恭顺,自然获福”的偈语,在那样一个场合说出来只能说很应景,但这句话对于他所面向的听众所能起到的影响,可能并不如预想那样。我们必须了解,朝鲜王朝一直推行“尊儒排佛”的政策,官员士大夫阶层对佛教尤其排斥,乾隆授命朝鲜使臣进见藏传佛教领袖班禅,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正如朝鲜使节不得已从班禅那里而领受的礼品小铜佛转手就被交给译官处理掉一样,“永远恭顺,自然获福”这句话,多半也被他们听过之后就抛到了脑后。

## (二) 白头之交——卢以渐与蒙古族学者博明的交往

在对燕行文献的研究中,朝鲜士人与中国士人之间的交往,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双方交往活动一般通过诗文酬答、礼物交换以及笔谈等形式展开。而其中笔谈的部分,最能够直接体现双方的思想交流。卢以渐出使期间和清朝士人的交流并不多,整部《随槎录》中只留下两次笔谈记录,都是他和一位名叫博明的蒙古族学者的对谈。

<sup>①</sup> 该奏闻全文如下:“臣等遵旨派员会同理藩院司员等,带领朝鲜使臣正使朴明源、副使郑元始、书记官赵鼎镇等,前诣扎什伦布拜见额尔德尼。行礼后,令坐吃茶,询问该国远近并入贡缘由,该使臣答以因皇上七旬大庆进表称贺并恭谢天恩。额尔德尼闻之甚喜,即囑令永远恭顺,自然获福,仍给以使臣铜佛藏香毡毯等。该使等当即叩谢,所有给与使臣等铜佛对象,开单呈览。为此谨具奏闻。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奏。奉旨知道了钦此。”见前引《同文汇考》第一册,第287页。

<sup>②③⑤</sup> 参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89、185、185页。

<sup>④</sup> 见前引《随槎录》,第267页。

博明(1718—1788),字希哲,一字晰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人,隶满洲镶蓝旗。1752年进士,1755年授翰林院编修,1763年出守广西庆远府,1772年任云南迤西道,同年参与征缅甸的军事行动,1777年降兵部员外郎,1785年参加乾隆所设“千叟宴”并作恭和御制诗一首。著有《西斋偶得》、《西斋杂著二种》、《西斋诗辑遗》和《西斋诗草》。<sup>①</sup>

卢以渐与博明的会面并非偶然。来中国之前,他从1749年出使的俞彦述的日记中了解到博明,对他的学问颇为仰慕,于是此行来到北京后专门托一位名叫赵明会的主簿介绍博明与自己见面。<sup>②</sup>事实上,不仅俞彦述的日记提到过博明,1766年出使的洪大容也提到了他。按照洪大容的说法,朝鲜使节到北京以后做各种买卖主要通过黄、郑两姓商家代理,而博明是其中黄家的女婿,每次使节向担任翻译的中国人(他们通常都直接介入到买卖过程中,与两家商户很熟悉)打听当地有学问的人时,他们首先推荐的当然就是自己最了解的博明。<sup>③</sup>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博明与朝鲜使节往来密切的原因。而朴趾源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岁价之人燕也,士大夫使员译求书堂额,则必博明之笔也。……盖明乃朝鲜主顾黄氏之婿,故员译知博起居善书。”<sup>④</sup>其后,1776年的进贺兼谢恩正使李澂,当也与博明有过交往。<sup>⑤</sup>同年,三节年贡使书状官申思运的随员罗杰,曾向博明请教“硕妃事”。<sup>⑥</sup>此后就是到了1780年,卢以渐和朴趾源两人都和博明有过接触和笔谈。卢以渐和博明的两次笔谈分别发生在这一年的八月初十和八月二十二日,地点都是在朝鲜使者下榻馆舍旁的小酒馆里。<sup>⑦</sup>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山庄杂记”中记载了和博明的一段对话,<sup>⑧</sup>而据卢以渐记载,他与博明第二次对话时,朴趾源也参与其中。<sup>⑨</sup>

卢以渐和博明两人的笔谈,既有卢以渐向博明提出关于中国学术文化的问题然后博明进行回答的内容,也有在个别问题上两人展开深入讨论和交锋的内容,其中涉及中国儒学流变、科举、三教问题、程朱后人的情况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具体的地名考据问题,在此不能一一展开,仅举两条材料为例:

余曰:曾闻中华道学分而为二,朱、陆并行,今则抑或归一耶?

明曰:道学至北宋而大,明朱子承周、程、张四子之后集其大成,自为嫡派,同时象山翁崛起于江右,其学以尊德行为主,遂与朱子异,然所异无甚大也。明阳明王氏一以陆为法,

① 参见白·特木尔巴根:《清代蒙古族作家博明生平事迹考略》,《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呈现了博明作为一名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的诸多面相,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博明的蒙古族身份,作者是在经过一番考证后才确认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文献中都只提到他是满洲镶蓝旗人,而作者从清代《八旗文经作者考》中找到一条记载,称博明是“博尔济吉特氏,隶满洲镶蓝旗”,才由其姓氏确定其为蒙古族。而关于这个问题,卢以渐在《随槎录》提到:“(博)明即蒙人,其曾祖为清之驸马”(见前引《随槎录》,第261页),不仅明确指出博明的民族属性,还揭示了其隶属满洲镶蓝旗的原因。

② 参见前引《随槎录》,第255—256页。卢以渐在日记中写到:“余曾见俞判书彦述为书状时日记,则盛称博明学术文章,心甚嘉之,来此后欲为结识。”卢以渐提到的俞彦述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任书状官出使清朝,其有《松湖集》六卷三册存世,现藏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编号:古3428-78-v.1-3。

③ “数十岁以前,使行人燕,凡公私买卖。惟有郑黄两姓当之……黄商豪富,本不及郑商,然子孙犹世守其业,有婿曰博明,蒙古人,善书能文章,每使行访问秀才,译辈必以博明应之。其后登科为翰林编修。是行亦问之,方为南方知府云。”见洪大容:《湛轩书·燕记·铺商》外集卷七,收入[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245册,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258页。另,洪大容出使时间是1766年,此处“方为南方知府云”的记载,与博明于1763年出守广西庆远府相契合。

④ 见朴趾源:《燕严集·别集·钟北小选·记·翠眉楼记》卷七,收入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第153页。

⑤ “博明书扇纸本。博明蒙古人,自称博王孙,书极精遒,知名中国。今此二扇,皆以泥金书之。李忠穆公澂,奉使入燕时得来者也。余得以藏宝,为释教豪夺,为可恨也。”见南公辙:《金陵集·书画跋尾》卷二十三,收入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272册,第451页。

⑥ “近世罗杰入燕京,见博明问硕妃事。”见李德懋《青庄馆全书·盎叶记七·硕妃》卷六十,收入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69页。又“余友人罗杰仲兴……岁丙申仲冬,随申书状思运入燕,其时正使,即锦城尉也。”见前引《热河日记》,第272页。

⑦⑧ 参见前引《随槎录》,第255—261、268—277、268页。

⑨ 参见前引《热河日记》,第249—250页。

主致良知，致良知本出孟子，非异说也，但其冥心求道，不觉流入禅家矣。其初显与朱异，后复为晚年定论之学，将欲援朱而入陆，则不可也。阳明其忠孝大节、文学武功，震于一时，学人为其所笼，遂入王矣。然道学究以程、朱为正。<sup>①</sup>

这番对话出现在两人第一次笔谈时，在一番简短的寒暄之后，卢以渐向博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儒学流变及现状。后者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指出了程朱理学始终一脉相承至今，陆王心学兴起沿革及产生影响的过程，最后表达了中国当时儒学仍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观点。事实上，这段材料所呈现的只是两者关于儒学讨论的开始，其后两人围绕理学与心学展开的对话，占据了两人笔谈的绝大部分，包括对德与性、心与理关系的讨论等。总的来说，卢以渐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心学知识比较感兴趣，希望通过博明的介绍了解更多，而两人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统的观念始终是一致的。对于关心中韩儒学思想交流的研究者来说，这部分笔谈资料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

此外，卢以渐也向博明提出宗教相关的问题，他提问的一个预设是当时中国存在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情况，并希望了解哪一种宗教最受尊崇。

余曰：三代所尚各有损益，盖大朝所尚三教之中，谁为最崇耶？

明曰：无三教之名，儒之外有二氏也。

余曰：崇儒之教，钦仰钦仰。

明曰：儒，人理也，二氏自为异说，以行其志，今二氏之后衰矣，不过借其教以养生，古之所谓大养济院，诚是也。（自注曰：养济院养贫氏之所。）韩子辟佛，同时僧人皆大学问，□行足以与儒敌。韩子若生于今日，见无赖僧人，必不辟佛。<sup>②</sup>

博明的回答是中国并无所谓三教并行的情况，儒学或者说儒教是凌驾于其他两者之上的存在。不仅如此，博明还认为当时的佛教和道教都在走下坡路，其影响力根本不足以与儒学思想相匹敌，因而也没有必要再对它们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对于清代儒释道三教状况问题，不同研究者有不同认识，但是这一段材料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人的一种具体想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事实上，认为儒学是超越于佛道两教之上的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的士人群体中似乎比较普遍，从其他一些材料中也可以得到旁证，比如朴趾源遇到的一位任职讲官的蒙古人破老回回图，就曾表示过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把儒看成一种宗教就是自退于九流之列，儒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存在，是天下之道，不可以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等同。<sup>③</sup>总的来说，博明对三教问题的认知态度，和当时朝鲜士人的普遍观点比较相近，朴趾源就曾经表达过佛教“不待辞避而其教自绝”的观点，<sup>④</sup>和博明如出一辙。

卢以渐和博明两人年龄相仿（博明长卢以渐两岁），志趣相投，学术思想也比较一致；两人相识之后，愈发彼此钦慕。他们的第二次笔谈持续终日，以致“日暮罢归，深痛怅矣”。<sup>⑤</sup>卢以渐和博明当时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位白头老者在小酒馆中相对而坐，案上谈纸成堆，两人不时发出阵阵会心长笑，那是何等融洽的场面。在《随槎录》的最后，附有卢以渐所写《与博詹事书》，行文中毫不吝惜赞美之辞，称誉这一位在万里异国结识的挚友。<sup>⑥</sup>两人之间建立起的跨国友情，足以成为一段佳话。

①②⑤ 参见前引《随槎录》，第256—257、258、277页。

③ 此事详见前引《热河日记·黄教问答》，第172—174页。朴趾源在酒楼偶遇此人，对谈中得知他叫破老回回图，蒙古人，字孚斋，号华亭，现任讲官，后来又了解到，此人还是康熙皇帝的外孙。《热河日记》“倾盖录”中，有其小传：“破老回回图，蒙古人也，字孚斋，号华亭，见任讲官，年四十七，康熙皇帝外孙。身長八尺，长髯郁然，面瘦黄骨立。学问渊博。余遇之酒楼中，为人颇长者，所带僮仆三十余人，衣帽鞍马豪侈，似是兼兵官也，貌亦类将帅。”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63页。

④⑥ 朴趾源和清朝学者谈到本国的宗教问题时曾说：“至敝邦立国四百年，土族虽愚者，但知诵习孔子。方内名山，虽有前代所册精蓝名刹，而皆已荒颓，所居缙流，皆下贱无赖，维业纸屨，名虽为僧，目不识经，不待辞辟而其教自绝。国中元无道教，故亦无道观，所谓异端之教，不期禁绝，而自不得立于国中。”见前引《热河日记·黄教问答》，第168、336—338页。

### (三) 万里他国无事往返——“尊明排清”思想在《随槎录》中的体现

先来看《随槎录》中一条1780年五月二十四日使团一行渡鸭绿江的记载：

各务差员及本府吏校皆拜辞于船头，吾所守厅通引拜别而语曰：“万里他国无事往返”。闻其言始觉有远行之意，而不无凄黯之怀矣。<sup>①</sup>

在很多朝鲜士大夫心里，清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他国”的概念，往昔将明朝视为“天朝”、“上国”的心态，在面对清朝时几乎荡然无存。以至于进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这样重大的外交任务，在一个普通朝鲜士人的口中也只是“无事往返”而已。卢以渐当然是认同了同僚的这一看法，所以才会“不无凄黯之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条记载给整部《随槎录》奠定了一个情感基调，卢以渐是怀着一种无事往返的无奈和凄怆之情前往清朝出使的，整部《随槎录》都充斥着一种对明朝追思和对清朝排斥的感情。最直接的一点，书中凡提到明朝多以“皇明”称之，而提到清朝，则仅以“清”、“清人”、“彼国”、“彼人”等称之。除此之外，亦有其他一些具体例子。

比如，七月初十日，使团行人一处道观。卢以渐记载：

使行入道观小憩，道士许姓人者……入柵以后彼人皆剃发而辫发于后，……至是始见结髻着冠之人，不觉欢欣亲爱之心。概亦见我辈而有欢厚之意，然其为人则近于多诈矣。然使我生于中国，则逃身于道士之外无他道矣。<sup>②</sup>

卢以渐无意中发现，在清朝统治下道士可以不用剃头，并且可以保留结髻着冠的装束，不由发出如果自己生在中国，一定会投身于道士之列，以避免剃头之令、保持明时衣冠的感慨。这无疑卢以渐排斥清朝统治、思念明朝心态的流露。由于剃发问题而引发卢以渐排清心态流露的，还有一个例子，即《随槎录》九月初四日的记载：“过汉吏部侍郎王世英家，小憩于门外，世英方去密云，而其二子年才十四五，而清扬玉面可爱，然剃辮之容、衣巾之状与满人无少异，殊可惜也。”<sup>③</sup>

此外，卢以渐在北京看到一部名为《樵史》的书，<sup>④</sup>其中内容又引起了他对明朝的追思。《随槎录》八月初八日记载，卢氏在这一天向相知之人借得《樵史》一读：

所谓《樵史》者，明之亡后有隐夫子作此书，备载其败亡之源。以寓伤悼之意而名之以樵者，似取樵采遗事，归于爨火之意，概野史之类也，其中所载者多有悲愤之语，而如伐宁远救朝鲜以致府库枵然，始行钞法，民皆为盗，竟至于亡者，尤为悲感矣。<sup>⑤</sup>

关于这本《樵史》，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也有记载：

《樵史》一卷，不知何人所著。记明室乱亡之由，以寓悲愤。其载客氏及杀熊廷弼事，颇多异闻。又咎万历自救朝鲜，府库空虚，人民流离，而在朝之臣罔知所措手。有一妾人，言采矿于时相，遂欣然行之，民益大困，皆化为盗贼，以至于亡。言多悲切，与正使读之，不觉涕零。第缘行忙，未之腾。此系禁书，只此誊本。<sup>⑥</sup>

可见，卢以渐和朴趾源两兄弟看到《樵史》中提到远救朝鲜被归咎为明朝败亡的诱因之一时，反应是类似的，都感到悲切，乃至至于涕零。这实际上就是当时朝鲜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也是其对明朝怀有感情的一种表现。

①②③⑤ 参见前引《随槎录》，第183、205—206、290、253页。

④ 卢以渐看到的《樵史》，确切说是《樵史通俗演义》，它是一部产生于清初讲述明朝亡国历史的野史小说。研究明清小说的学者对该书有大量研究，而其中又以其作者身份的研究最引人关注。关于该书作者，曾有学者考证为陆应阳，后经证实此人只是碰巧写过一部同名的《樵史》，内容完全不同，只是由于历来有将《樵史通俗演义》简称《樵史》的习惯而引致这一误会。目前学界定论仍是该书作者未详，而卢以渐和朴趾源看到的本子同样没有注明作者，卢以渐称其为隐夫子所作，朴趾源也说不知何人所著，没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关于《樵史》作者问题的相关研究情况，详参杨剑兵：《〈樵史通俗演义〉作者考辨》，《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

⑥ 见前引《热河日记》，第287—288页。

再举一个看戏的例子。八月二十日,乾隆令使臣同往观戏。一次看戏的经历,又勾起了卢以渐对清朝统治者是“异类”、“胡人”的评价。卢以渐记载:“其戏甚多,有仙鹤自空中穿屋极而下来者,又龙驹自地中负河图而出者,甚至于华封人之祝造帝尧之像而戏之云”,卢以渐认为这些表演“不敬甚矣,如非异类,则岂有此等戏耶”。这是因为卢以渐由戏文内容联想到“昔孔道辅使契丹,优人作文定王戏,道辅叱而退之”,于是得出结论:“胡人之作此等戏,是其本习,殊甚骇痛。”<sup>①</sup>

而在朝鲜使节离京之前的上马宴中,清朝方面接待人员的表现,又让卢以渐对清人的不尊礼仪和行为粗鄙生出反感,见于九月十六日的记载:

彼人之来者,竞相攫取,喧聒乱嚷,声震天地,诚一变性,宴仪何等大礼,而么么下隶如是无礼,纲纪可见,实为骇然。<sup>②</sup>

最后,再来看一条关于衣冠服饰的材料,这是八月二十九日的记载:

拦街小儿见我我国衣冠,莫不绝倒,帽带者谓之场戏,我服者谓之高丽房子,指点而笑,盖街上设戏子游者,必着我我国帽带故云。<sup>③</sup>

清代不少燕行文献中,不约而同出现了大量有关衣冠服饰的记载。在清初的文献里,我们看到一些记载提到沿途汉人看到朝鲜使臣身着的衣冠,往往因勾起对穿着相同服饰先人的怀念而落泪。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一种情况慢慢少了,出现的是人们因为淡忘了大明衣冠,反将朝鲜人穿着戏服引为笑谈的情况,即如卢以渐所见。同时,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朝鲜使节在观看中国戏剧表演时勾起对大明衣冠的想象。<sup>④</sup>实际上,不管是陪着汉人流泪追思,还是对汉人数典忘祖的悲叹,或是从戏服中的大明衣冠想象汉民族历史记忆的留存,都表现出朝鲜士人对于明朝的怀念。而这种心态,卢以渐可谓集大成者。

卢以渐对清朝一边倒的消极观感,是其本身具有极强的“尊明排清”心态所致。事实上,卢以渐在这一点上是出了名的。朴趾源对此就有过明确的记载:“卢君以渐,在国以经行称,素严于春秋尊攘之义。在道逢人,无论满汉,一例称胡;所过山川楼台,以其为腥膻之乡而不视也。”<sup>⑤</sup>卢以渐的心态一点都不难理解,而且恰恰印证了一种观点:明清鼎革之后的朝鲜,自上而下笼罩在“尊周思明”的思想氛围中,尽管清朝对朝鲜德化政策的施行使得状况有所改善,但并没从根本上改变朝鲜对清朝的看法。<sup>⑥</sup>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随槎录》可以说为我们研究朝鲜王朝思想史提供了有意思的史料补充。

### 三、余论:“尊周思明”、“北学”思想与“小中华意识”

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卢以渐无疑是一个深受“尊周思明”思想影响的人物。另一方面,就朴趾源而言,一般都公认他是朝鲜“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随槎录》和《热河日记》这两个文献,我们把这两个人物联系到了一起。朝鲜的“北学”思想,被认为是对传统华夷观的一种突破,当这一思想在18世纪后期兴起之时,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盛行的“尊周思明”思想影响依然深远。姑不论其他方面,至少在对于清朝的态度这一点上,这两种思想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的。于是,我们或许就会假设这样一个问题:当“尊周思明”的卢以渐遭遇主张“北学”的朴趾源,是否会产生某些思想冲突?可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两个人关系的实际表现和我们的假设并不对应。总的来说,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使行途中他们一路同行,除了各种官方场合他们共同出席外,私下交往也比较频

①②③ 参见前引《随槎录》,第267—268、302、288页。

④ 参见葛兆光:《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⑤ 参见前引《热河日记》,第327页。

⑥ 参见前引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380—417页。

繁,经常一同出行、会客,也有过单独会谈的情况。<sup>①</sup>他们之间不仅未见任何因为思想观念问题而产生的冲突,相反卢以渐对朴趾源其人其学表示出相当的赞许。<sup>②</sup>这种情况一方面提醒我们任何假设都存在风险,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尊周思明”和“北学”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

另外一个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里,也并不是没有“尊周思明”思想的流露。比如全篇开头的纪年用到了“后三庚子”这一表述,其背后就是暗中尊奉明朝年号的“崇祯后”纪年方式;<sup>③</sup>而行文中亦多有“皇明”、“清人”的区别表述;“行在杂录”篇中又有“我今称皇帝所在之处曰行在而录其事,然而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sup>④</sup>被公认为“北学派”代表人物的朴趾源,却也写出如此“尊周思明”的文字,这又当如何解释?

“尊周思明”的卢以渐和主张“北学”的朴趾源之间并没有观念冲突,同时朴趾源思想中也有“尊周思明”的一面,这两个事实摆在面前,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尊周思明”和“北学”两种思想是否就真的如有些观点所认为的存在矛盾?事实上,如果我们放弃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并非如此。所谓“尊周思明”也好,“尊华攘夷”也罢,这样一种朝鲜王朝儒道独行社会背景下的华夷观念,可以被看作是一条在基底流淌的思想潜流,它造成了朝鲜时代士人的一种普遍文化心态,经年累月积淀之下,已经内化为一种情感层面的东西。再来看“北学”,它实际上是朝鲜王朝后期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从现实需求角度出发,主张向物质文化先进的清朝学习以利于本国发展的思想,它更多的是一种从理性层面出发提出的要求。这两种感性和理性层面的思想,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并存的,它们之间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更多地是表现为此消彼长的状态。

“尊周思明”的思想,发展到极端曾经带来朝鲜一部分士人的“北伐”意识,而“北伐”意识才是“北学派”曾经直接针对批评的对象。其背后的逻辑大体是,当过度保守的观念影响到朝鲜对清关系并阻滞“北学”的通道,“北学”者们会进行必要的驳斥。可见,“北学”思想并不针对“尊周思明”本身,而只是针对其衍生出来的一些极端思潮。事实上,“北学”思想不可能全盘否定“尊周思明”思想及其背后的华夷观念,因为后者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朝鲜王朝独立国族意识的构建,这是身为朝鲜人谁都不会去触动的底线。我认为,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和“尊华攘夷”,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对明朝的感念和尊奉,而是通过外在表现来彰显自己中华文化正统继任者的身份,继而借以建立本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和对外形象。此前学界所讨论的“小中华意识”<sup>⑤</sup>或者“朝鲜中华主义”<sup>⑥</sup>等等,实际上都和这一问题相关。

谈到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可以说自古有之,而这一问题在明清鼎革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也被最多研究者所讨论。我认为,对于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首先应该从时间维度对明、

① 据《随槎录》记载,九月初二日晚,卢以渐和朴趾源有过一次对谈,他们讨论的内容是“天地之运转”,即地动说。“初三日,……夜燕岩来过,论天地之运转,燕严以不但天与日月转动,地亦转旋,余则守朱子之说苦争其不转,燕说虽近无昏而颇有独得之妙,故作《西馆问答序》而与之。”见前引《随槎录》,第290页。

② 参见上条注释,另,卢氏在《西馆问答序》中这样描述朴趾源:“公长身、大面、眉秀、髯疏,有古人之风仪,性嗜酒,微醺弹西洋琴,使人歌而听之,豪谭雄辩,惊动左右,神采凛然,有捕龙虎搏虎豹气像”。见前引《随槎录》,第340页。

③④ 见前引《热河日记》,第1、187页。

⑤ “小中华意识”一词被孙卫国教授用到其所著述书名中,而据其书中注释,“小中华”的出处是吴庆元《小华外史》中的一句话:“小中华者,中国称朝鲜为小中华,以其礼乐文明亚于中国也。”他也提到,朝鲜许多史书中皆自称小中华。所以,小中华最初应该是明朝时中国人对朝鲜的称呼,而后来也成为朝鲜人的自称。见前引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第34页。

⑥ 关于“朝鲜中华主义”的论述,参见王元周:《朝鲜中华主义》,载《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大体而言,这一由韩国学者郑玉子教授提出的概念(见氏著《朝鲜后期中华思想研究》,一志社,1998年),较之“小中华意识”有更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其亦有助于我们从研究对象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问题。国内学者杨雨蕾在研究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时,就曾将北学思想与华夷观的关系置于“朝鲜中华主义”的框架下讨论,颇有见地。参见杨雨蕾:《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探源》,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清两个时期做明确的划分,两者存在根本的区别。其原因在于,前者那里还存在一个“大中华”的参照系,到后者那里则已经没有。当讨论明代的情况时,我们需要关注的尚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朝鲜王朝的文化附属性,其次是其自我文化优越感。而当讨论清代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时,事实上就只剩下唯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我们看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朝鲜儒者尹愔曾明确表达过在没有了大中华之后,朝鲜不当再称“小中华”,而应无愧于“中华”之称号的想法。<sup>①</sup>事实上,当没有了“大中华”的笼罩,“小中华意识”也就没有了附属性,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我表达。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清季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不应再被理解为其对清朝为代表的大中华文化的尊崇和依附,而是转变为其借以形塑自身独立国格的一种思想资源。尽管这种形塑没有使朝鲜完全独立于清朝之外,政治上朝鲜还是清朝藩国,思想上也在倡导“北学”。但我们似乎不应否认其在思想上逐步开始向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民族国家转变这一点。同时,我也倾向于认为,朝鲜半岛的民族国家化过程,不应该简单地被认为是到了近代以后,特别是经过了“殖民地近代化”之后才突然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小中华意识”本身,就是其民族国家意识的滥觞。

中国学者研究朝鲜的问题,必须避免带有一种从自身本位出发的优越感,即认为朝鲜始终对中国有一种依附性。明代的情况或许还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对于之后的情况,如果还一味地认为朝鲜没有脱离对中华文化或者中国的依附,就无疑陷入一种过于本位主义的立场,同时也是无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不科学的立场。只有在研究中尽量避免陷入这样的立场,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实。

[责任编辑 陈文彬]

<sup>①</sup> 朝鲜儒者尹愔(1741—1826)曾云:“然则昔日东方之称以小中华者,以其有大中华也。而今其大者,非复旧时疆域矣,地维沦陷,山川变易,曾无一片读春秋之地。而吾东方三百六十州之疆域,盖无非中华之衣冠谣俗,则优优乎大哉,奚可以小云乎哉。”见氏著《无名子集》册八,“东方疆域”,收在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256册,第334—335页。

## ABSTRACTS

###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Pidgin English

ZHOU Zhen-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never put attention on the pidgin phenomena of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ough Chinese pidgin English (CPE) had been popular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for 200 years. This paper represents the creation of CPE and details the process of arising, developing, transmission and setting, and figures out approximately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ntact histor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Key words:** creation; Chinese pidgin English (CPE)

### Reading the Korean Yanxing Literature *Sui Cha Lu* —On Korean Dynasty's Little China Consciousness

WANG Xin-l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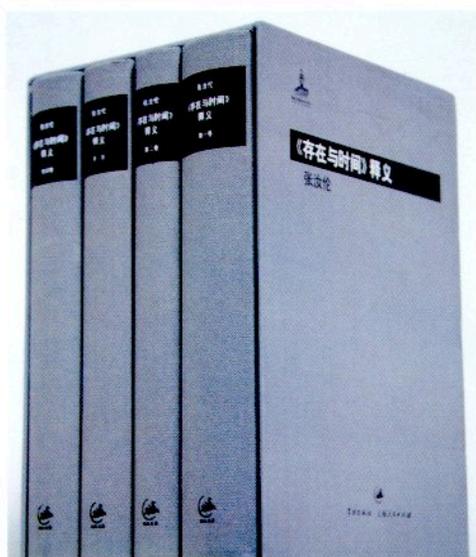
**Abstract:** The Korean historical material titled *Sui Cha Lu* written in 1780 by Lu Yijian during his stay in China was produced out of the same journey as the famous book *Rehe Diary* written by Piao Zhiyuan, but it is far less focused by researchers. This article gives a basic introduction of this book. It leaves us numerous intere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Panchen VI met Emperor Qianlong, and the writer's dialogue with a Mongolian scholar Bo Ming. The writer showed strong emotion of respecting the Ming Dynasty while rejecting the Qing Dynasty which was prevalent among the contemporary Korean intellectuals. Comparing this book to *Rehe Diary*, it can be noted that there existed another important ideological thought in Korean history – “Beixu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ittle China consciousness” of Korea Dynasty no longer be realized as an emotion of admiring China when it came into the Qing Dynasty, but a phenomenon which signaled Korea was seeking a way to establish the self-recognition of a national state.

**Key words:** Lu Yijian; *Sui Cha Lu*; Korea Dynasty; little China consciousness

## 《〈存在与时间〉释义》

张汝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张汝伦教授的《〈存在与时间〉释义》一书以中国古代传统的经典注疏为典范,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进行逐章逐节逐句的解释;通过将这部“难治”之作放入海德格尔自身思想发展的线索和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脉络中,揭示出海德格尔源发问题意识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以期超越我们的有限视角,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那种常识性的思维方式,在理解海德格尔的同时像海德格尔那样去

提问和思考。此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理由是“这一成果对国内的海德格尔研究和西方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5 期

主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 办 复旦大学  
主 编 汪涌豪  
编辑出版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邮 编 200433  
电 话 021-65642669  
传 真 021-65642669  
电子邮箱 fdwkb@fudan.edu.cn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 年 9 月 25 日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总发行 上海市邮局报刊发行处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 3101104000004

ISSN 0257-0289



9 770257 028133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Chief Editor: Wang Yonghao  
Editor & Publisher: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Fudan Journal,  
Fudan University  
Post Code: 200433  
Tel: 021-65642669  
Fax: 021-65642669

Printer: Zhonghua Press Shanghai Printing CO. LTD  
Distributor: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339 Beijing)

ISSN 0257-0289 国外代号 BM177 定价: 20.00 元  
CN31-1142/C 国内代号 4-246